

《自由中國》與冷戰思維

——以胡適為視角

桑 兵

[提 要]1949年由胡適、雷震等人創刊的《自由中國》，一改抗戰時期兩份《自由中國》對外反侵略對內爭自由的主旨，尤其是抗戰初期武漢的《自由中國》嚮往蘇聯接近中共的左翼色彩，在冷戰思維的主導下，以反共為基調，將敗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自由世界”相聯接，以蔣氏獨裁政府作為爭取實現“自由中國”的依靠，形成抵抗所謂“極權主義”的基地。對美國的盲信盲從，使之成為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殉葬，也相當程度迷失了自由追求的初衷本旨。

[關鍵詞] 《自由中國》 胡適 冷戰思維

[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3 - 0169 - 15

關於胡適、雷震、殷海光與《自由中國》的公案，前人研究已多，材料大體詳備，事實基本清楚。只是這份 1949 年創刊的《自由中國》在整個近代“自由中國”的歷史上居於何種地位，扮演何種角色，胡適和《自由中國》為何會堅信依靠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政權可以通向“自由中國”，且反共是爭取和捍衛自由的前提條件，而其自身的經歷以及刊物與編者的悲劇性結局，又顯示《自由中國》在“自由中國”其實很不自由。尤其是《自由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冷戰局勢以及冷戰思維的關聯，以往的研究還有不少未竟之意，可依本文主題深入探究。

一、“自由中國”裡不自由的《自由中國》

提起“自由中國”，人們首先會聯想到冷戰時期海峽對岸在美國的支持下，由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借此名目展開的反共宣傳。然而，那一時期常常被各方痛批專制獨裁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未必敢於率先掛出“自由中國”的招牌，以免引火焚身。“自由中國”這塊牌子，又似乎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密切。被推崇為中國自由主義領袖、後來也自稱始終堅持自由主義的胡適，在 1959 年 11 月 20 日《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演講，談及《自由中國》發端的歷史，就提到創刊之際可能他們幾個人是最早用“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的。此說如果僅指 1949 年創辦的《自由中國》，勉強可以成立，若是放寬到整個近代中國以及《自由中國》的整個歷史，則嚴

重失實。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十周年紀念聚會，到客百餘人，胡適講了40多分鐘話。之前毛子水寫了《〈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發表於《自由中國》第21卷第10期。毛子水在《自由中國》創刊時曾參與其事，據他說：“十年前這個時候，大陸國土的大部分已陷於‘共匪’，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一班憂時憂國的人，以為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不可沒有一種辨析是非的刊物，以關‘共匪’的邪說而堅定同胞的意念。於是《自由中國》遂因以誕生。我所知道的，當時這班人創辦這個雜誌的動機，純粹是一片愛國家、愛自由的誠心。……並沒有稍減。偶有過於偏激的言論，恐怕都是因為執筆的人蒿目時艱、傷心國難而遂逾矩的。”^①

胡適的話是接著毛子水的文章講的，後來發表時由毛子水大力修改，題為《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詞》。關於《自由中國》的創辦，胡適這樣回憶到：“記得民國三十八年三四月間，我們幾個人在上海；那時我們感覺到這個形勢演變下去，會把中國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兩部分，所以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一個‘自由’與‘奴役’的分野，同時更不能不注意‘自由中國’這個名字。我想，可能那時我們幾個人是最早用‘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的。後來幾位朋友想到成立一個‘自由中國出版社’。當初並沒有想要辦雜誌，只想出一點小冊子。所以‘自由中國出版社’剛成立時，只出了一些小冊子性質的刊物。我於四月六日離開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在將要離開上海時，他們要我寫一篇《自由中國社的宣言》。後來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憑我想到的寫了四條宗旨，寄回來請大家修改。但雷先生他們都很客氣，就用當初我在船上所擬的稿子，沒有修改一字；《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以後，每期都登載這四條宗旨。”^②

“自由中國”的歷史，的確與《自由中國》的刊物密不可分。只是這並不僅僅指1949年發刊的《自由中國》。從抗戰爆發到1949年，三份同樣以《自由中國》為名的刊物，呈現了“自由中國”四個階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在此過程中，“自由中國”的內涵發生了根本變化。1938年武漢保衛戰前夕由孫陵等人創刊的《自由中國》，是最早以《自由中國》為名的綜合性刊物，得到左翼文化人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主張犧牲個人的自由以爭取中國的自由，抵抗日寇侵略，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同時要以新啟蒙運動發揮每個人的獨立自由。後在桂林復刊，色彩有所減褪。第二份《自由中國》於1945年在上海由剛剛恢復公開活動的淪陷區國民黨地下區黨部組織創辦，在重光聲中歡迎來自“自由中國”的領袖和將士，對擺脫奴役重新回到“自由中國”的懷抱無限期待，不過很快就從重慶來人異樣的目光中感受到不自由的氣息，並以新聞檢查的廢止與否，作為判斷“自由中國”是否有基本自由的衡鑒。與第三份《自由中國》明顯不同的是，前兩份《自由中國》沒有反共的內容，而且第一份並不以蔣介石國民政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所要爭取的國家和民族的自由，既要反對外來侵略者，又要消除內部的種種障礙，才能最終實現。其理想的模式，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剛好是胡適等人所辦《自由中國》的矛頭所向。

胡適所說的四條宗旨，在1949年5月15日的日記有全文記載：

自由中國社的宗旨

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制，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

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③

胡適日記記錄的文本，並非當時的擬稿，而是由張佛泉寄回來的定稿。只是據胡適說雷震等人一字未改，等於和初稿一樣。張佛泉，名葆恒，先後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和燕京大學政治系任教，《自由中國》主要撰稿人之一，被認為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重要理論家。

《自由中國》1949年11月在台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為雷震和殷海光。包括胡適在內，這批人與國民黨頗多分歧和矛盾，而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夾在國共之間的人大都寧可拋棄前者倒向後者。與國民黨淵源甚深的顧頡剛認為：“實在，人心並不傾向共產黨，而厭惡國民黨太甚了，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權。”^④他反對傅斯年挾胡適以自重，勸胡適不要到南京，免入是非之窩。“當國民黨盛時，未嘗與共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平日為國民黨排擊，今日乃殉國民黨之葬，太不值得。”^⑤

問題是，顧頡剛的這些看法，胡適真的沒有感同身受嗎？何以他認定被普遍厭棄的國民黨可以依靠，而共產黨必定是極權統治？從他擬定的《自由中國》宗旨看，“自由中國”運動的起點是抵制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最後目標則是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一方面要幫助“淪陷區”的同胞恢復自由，一方面要督促政府改革，建設自由民主。也就是說，胡適並沒有將當時的“中華民國”視為自由中國，可是也不像多數人那樣，將“國民政府”看成是專制獨裁的政權。或者說，他雖不以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為然，相較於共產黨，他寧可支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胡適後來被尊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袖，可是由於相當長的時間裡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形象頗為負面，胡適並不願以此自任。直到1947年他還說：“在當時，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可怕的稱謂，所以最好說我是一個獨立主義者。”^⑥而在胡適的認識中，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天然對立。1941年胡適曾說：“所有社會激進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獨裁政治，因為只有絕對的權力才能完成激進革命的任務；只有暴力和無條件的恐怖主義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後來他看了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不能共存，覺得“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為 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發展），近十年來，我漸見此意之不是，故蔣廷黻兄提議我們發起一個‘社會黨’，我不贊成。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信條乃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不能接受各種社會主義信條。”^⑦

社會主義主張在政治平等的基礎上實行經濟平等，所以照理說社會主義確是民主運動的邏輯發展。一口咬定社會主義與自由不能共存，無疑是胡適堅決反共的重要思想基礎。但這仍然無法解釋他何以會在國共決戰之際支持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政權，而且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當作建設自由中國的不二選擇。誠然，胡適並不隱晦他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甚至有時會當面讓

蔣介石覺得難堪。但是這些都建立在他對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無條件支持以及蔣對於這種支持一定程度信任的基礎上。一旦蔣對此產生懷疑，胡適則會以近乎效忠的表白刻意澄清。

1960年11月18日，雷震案重審之前，胡適面見蔣介石，談到國際形勢，指出當局三個月來在雷案上的措施實在在國外發生了很不好的反響。蔣說：“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反共救國的政府，雷震背後有匪諜，政府不能不辦他。我也曉得這案子會在國外發生不利的反響，但一個國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權，我們不能不照法律辦。”胡適表示軍法審判，量刑很重，時間很短，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抬不起頭。蔣忽然講，去年曾對某某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傲寰，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聞言，當即表示從來沒有聽某某說過。“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是常常勸告雷傲寰的。”並且曾對雷說，民國卅八年四月到舊金山，新聞報導國共和談破裂，紅軍過江，接受採訪表示：“‘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說的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過，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這番話，我屢次對雷傲寰說過。今天總統說的話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總統重述我在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鄭重的說過的那句話。”^⑧

蔣的重話，含有將胡適與雷震視為同黨之意，而胡適舊話重提，則是以哀怨之詞向蔣輸誠。可是，不支持蔣的國民政府還能支持什麼政府，國民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的理據，與獨立主義、健全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理念相差太遠，令人質疑胡適的自由主義究竟徹底到何種程度。如果作為領袖旗幟的胡適也不過如此，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要麼還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遊魂，要麼就只能做小罵大幫忙的幫閒而被視為幫兇。在蔣介石的心目中，胡適不過是與“自由世界”聯繫的門面，其作用主要是可以掩飾其統治的專制獨裁，呈現“自由中國”的假像。

不過，胡適的道義支持顯然不是建立在信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基礎之上，他堅定不移地反共，是因為認定社會主義勢必採取“極權主義”，不能與自由共存。早在1941年7月，胡適就在密西根大學發表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演講文刊載於《美國政治社會科學會年報》（*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218卷，後來中譯本經過胡適改訂，發表於1949年11月20日的《自由中國》創刊號。從內容看，改動不小，包含了一些戰時乃至戰後的信息，不能直接、完全作為1941年7月胡適認識的憑據，但其中徵引了1941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的伊司曼（Max Eastman）的一篇通訊，認為正在進行的戰爭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是有史以來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不僅是為了國家的權力。伊氏列舉了極權主義的20個重要特點，其中每一點在共產主義的蘇俄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以及義大利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因而認定20點相反的生活方式，都是由於主義的衝突。^⑨

1950年9月，獲悉大陸開始批判胡適，過去的同事學生乃至自己的兒子也加入其中，胡適就表示：過去我們注意到，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但現在還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中也沒有“沉默的自由”。外國媒體就此評論道：胡適代表的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胡適博士時常睿智地尖刻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種種錯誤。然而，當面臨國民黨政府與共產主義（從知識上和道德上奴役人）兩種選擇時，他顯然選擇了前者。^⑩這樣的推論，符合冷戰思維的邏輯，但是，胡適一度對社會主義不無好感，甚至可以條件地接受集權專政，根本排斥，總有其動因和變化過程。況且，作為自由主義者，用現實的專制獨裁對抗可能的極權主義，還是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二、服從“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

毛子水的《〈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展現了中國這些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內心矛盾及其自辯的邏輯，他說：

一種正當的倡導輿論的刊物，一方面固然應該督促政府作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改革，一方面亦須支持政府良善的計劃以增加政治的效率。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主持言論的人，要處處“務其大者遠者”，要處處“綜核名實”。較小的事情，似乎可以不必斤斤計較。說到“大者遠者”，我想起現在世界政治上的一個問題。共產極權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的鬥爭，一天比一天緊急。我們中華民國堅定的站在自由民主這一方面，是我們政府最聰明的決策。以一個實行自由民主較有成就的美國來引導其他民主的國家，亦是最好的事情。我以為這些民主國家應該一心一意的擁護美國的策略，盡可能避免使美國為難，使美國得以從容調度，以全力對付共產極權的蘇俄和它的附庸。但是泛觀今日自由世界，對於這個道理，非特許多愚陋小國不瞭解，即英、法、日本，亦沒有十分明白。他們往往為爭一點無謂的意氣（多半為迎合自己國人的虛驕心！）不能和美國完全合作，致減少了抵抗共產集團的力量。我並不是說美國的策略盡善盡美，我們應該唯命是從；但大敵當前，自由民主的國家如不能做到完全合作，必致失敗（在合作上面，我們中華民國似乎比較得體）。當然，我亦深望美國的國民，能夠徹底瞭解共產極權的作風。蘇俄的集團，非特是人類文明的大害，亦是美國立國精神的仇敵。

真正忠於美國、忠於正義的人，萬不可貪一時的苟安而忘卻對國家對人類的責任的。^①

由此可見，《自由中國》之所以將退居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視為“自由中國”的希望所在，完全是因為“中華民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站在一起，其敵視中共，則是因為認定後者為蘇俄的附庸。而美國作為實行自由民主較有成就的國家主導“自由世界”，就可以對付共產極權陣營，並且促使“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都變成自由民主國家。為此，自由民主國家應該全心全意擁護美國，服從美國。這方面，站在“自由世界”一邊的“中華民國”甚至比英法日本做得更好。

然而，與《自由中國》創刊的旨趣相比，毛子水的說法顯然自相矛盾。《自由中國》的《發刊詞》聲稱：

一個自由的國家，和極權的國家不同，一個極權的國家，非特不能給人民以自由，並且也不能給人民以安全。一個自由的國家，更不能做任何其他國家的附庸。^②

不做任何國家的附庸，如果僅僅用於攻擊中共與蘇聯的利器，就有偏執的故意之嫌。擁護多數人認定的獨裁政權做美國的附庸，而且將這樣的行徑說得道貌岸然，儘管當事人從政治現實考量認為天經地義，合情合理，拋開立場的是非，單單從邏輯判斷，就不僅僅是虛偽，而且很有些居心叵測。

毛子水的這番言論，與胡適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早在1952年1月27日，自稱“我是北京大學的胡適”就直言不諱地說：

我們大家都是反對共產黨的，都是要解放大陸，建設一個自由中國的。我們要往前看，要看清楚世界的形勢。我要對大家說：今天世界的形勢是於我們有利的，是於我們反共復國的運動有利的。今年的形勢比去年好的多，比前幾年更好的多。前幾年，共產黨在歐洲，在亞洲，處處勝利。那是因為西方愛和平的民主國家看錯了國際的危

機，他們把自己的武裝全解除了，把自己的力量全取消了。結果是，他們讓共產黨國家的力量一天天加強，變成了歐洲最強的武力，變成了亞洲最強的武力，變成了世界上最強的武力。這是六七年來共產黨在歐洲亞洲處處橫行無阻的主要原因。但是，最近這一兩年來，國際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愛自由的西方國家，現在已認清了共產主義確有征服全世界的陰謀，所以他們不能不把他們自己重新武裝起來。所以，在美國的領導與援助之下，西方的自由國家現在正在建立起自由世界保衛自己、反抗侵略的共同力量。這個自由世界的共同力量的建立，是這一兩年來世界形勢的最大的變化，最大的進步。自由的中國當然需要自由的世界。但是自由的世界當然也需要一個自由的中國。我們眼看見這個自由世界一天天強大起來。我們可以相信，我們大家心裡的希望的實現機會，今年一定比去年好的多，一定比前幾年好的多！^③

據 1953 年 1 月美國《時代週刊》的文章，“胡適把國民黨重新奪取大陸的鬥爭比作是二戰時法國從納粹鐵蹄下解放自己的鬥爭。但是，他告誡台灣要有耐心和毅力。‘法國的解放’，他說，‘不僅需要忠誠的法國人的共同努力，……還因為自由法國是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深知，五十萬國民軍不足以重新奪回大陸。我們的未來是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緊密相聯的，而自由世界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是否要讓大陸上的四億五千萬人民受世界共產主義的赤化。’”^④胡適堅決反共，很大程度是將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視為蘇聯世界戰略的一環。1950 年 8 月 15 日，胡適花了 40 天工夫用英文寫的《史達林的戰略在中國遭到二十五年的抵制之後如何獲勝》一文完稿，後經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筆建議，改題《在史達林戰略裡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⑤由此可見，胡適等人是從二戰後的世界格局來決定對國共兩黨的從違取捨。在他們心目中，國共衝突其實是世界兩大陣營對立的有機組成部分。

這樣的自由主義，究竟是理性還是盲從？由此信念主導，胡適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成就均予以根本否定。1952 年 4 月 2 日，他在遠東學會波士頓年會宣讀《從開放門戶到鐵幕政策》，“讀了之後，即有中國親共的學生兩人站起來質問反駁，其一人‘氣’得說話四面打旋！其一人問：‘你不信中國現在比從前強（stronger）了嗎？’我說：‘No（不）。’他又說：‘中國現在不比從前更獨立了嗎？’我大聲說：‘No（不）！’”^⑥同年 5 月 5 日，胡適在馬歇爾空軍大學空戰學院演說《中國和西方》，以為有三點樂觀的根據：“1. 一百多年與西方近世文明接觸的影響不容易消失。2. 這三年的中共統治使中國人民嘗到了空前的暴政的滋味，所以我們可以說，現時的人民絕大多數是反共的。3. 最大的安慰在於西方國家的重整軍備。……今日的西方力量雖比不上一九四四——四五[年]，但已比一九四七[年]增加幾十倍了。”^⑦

以這樣的信念為支撐，胡適在美國多次以“自由中國”為題發表演講，鼓吹“自由中國”對於“自由世界”的重要性，希望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不要放棄對台灣蔣介石政權的支持。朝鮮戰爭爆發和中國出兵參戰，令瀕於絕望的胡適感到生機重現。1955 年 1 月 25 日，在胡適看來至關重要，“這一天的國際形勢的變化（看附粘的三個文件），是一九四五年至今九年中的最重大變化。我這幾年來，人問我‘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我總回答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今天的變化是‘近在眼前’的趨向了。”胡適的依據便是美國關於台灣問題的國情咨文，總統艾森豪威爾給國會的遠東政策主要內容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目標是建立並維護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以確保美國的安全。二戰後，台灣及其周圍島嶼為我們友好的同盟所掌握。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所有的自由國家有著共同的利益，認為台灣及其周圍島嶼不能落入共產主義力量之

手。美國打算擴大在該地區的義務，必要時將採取應急行動。美第七艦隊仍在該地區執行防禦任務，美國將繼續給國民黨政府以經濟與軍事援助。明眼人不難看出，美國的政策完全是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可是兩天後胡適記道：“艾氏的牒文是十年來的最重大的變化，故是吾國的大收穫，大轉機。”^⑩這與胡適所倡導的治學論事態度，可謂大相徑庭。

同樣出於這樣的信念，胡適對於包括第三勢力或組織反對黨在內的一切與國民黨立異的有組織活動，一概拒之於千里之外。1952年5月7日，張君勱為第三勢力來談。胡適對他說：“此時只有共產國際的勢力與反共的勢力，絕無第三勢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⑪這使得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立主義者因沒有第三勢力而慨歎，也因為胡適忽視了他們而不滿。1957年8月30日，胡適寫長信給雷震，勸他們切不可輕信流言，說胡適之可以出來領導一個反對黨。^⑫

1960年10月，胡適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謂反對黨的發言人前來看望，胡適答應10月26日晚飯面談。當天上午，胡適去見“副總統”陳誠，把要說的話先行報告。“我要勸告他們兩點：一、在時間上要展緩他們成立新黨的時期：他們應該看看雷案的發展，應該看看世界形勢，如美國大選一類的事件。不可急於組黨。二、我要勸他根本改變態度：第一，要採取和平態度，不可對政府黨取敵對的態度。你要推翻政府黨，政府黨當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必須要和民、青兩黨合作，和無黨派的大陸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夠爭取政府的諒解——同情的諒解。”同時表示希望：“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新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⑬

毛子水認為，說話要有力，當使說話順耳。對於國民黨，胡適的確做到了順耳而有力。1959年3～4月間，胡適寫了《容忍與自由》，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引美國康奈爾大學史學大師布爾（George Lincoln Burr）的一句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⑭。胡適後來反復說：“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如果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都覺得他們的信仰不會錯，他們的思想不會錯，他們就不許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大家都應該覺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因為難免有錯，便應該容忍逆耳之言；這些聽不進去的話，也許有道理在裡面。”^⑮

胡適如此說法，不無有意無意替政府說話之嫌。1946年他在北大開學典禮上演說，引宋朝呂伯恭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次日報上發表，引起中共的批評，說是欺騙民眾，替蔣和國民黨辯護。在胡適看來，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面。要去壓迫和毀滅的東西，可能是真理，或包含真理，對的思想不讓人家討論或批評，就成了成見和教條。“言論所以必須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們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我們所認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錯的。”^⑯歐洲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出現過主張自由

的人摧殘自由。

看了胡適的《容忍與自由》，毛子水寫了《〈容忍與自由〉書後》，殷海光寫了《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都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7期。殷海光贊成容忍，但認為無權無勢的人容忍容易，有權有勢的人容忍很難。胡適“應該多向有權有勢的人說說容忍的意思，不要來向我們這班拿筆桿的窮書生來說容忍。我們已是容忍慣了。”而胡適認為，其實書生也有力量，可以使有權有勢的人感到危險。因此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因為有權勢，才受到種種我們認為不合理的壓迫，甚至圍剿。我們的力量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正因為我們是強者，必須有容忍的態度，不要濫用權力。雷震說“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其實很難。特刊不請代表官方的、反對的、壓迫者的人做文章，說明還是抱有成見。^②

殷海光的話，已經充滿怨氣。對於《自由中國》在“自由中國”裡的十分不自由，所有《自由中國》的參與者都有切身感受。圍繞《自由中國》所展開的“自由中國”有無言論自由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胡適本人對於“自由中國”的自由度，也是感同身受。對外，他要維繫“自由中國”的形象。1952年8月底，浪跡北美、生活窘迫的胡適本已表示接受牛津大學教授職，但因英國此前已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好友的影響下，胡適又改變了主意，拒絕赴牛津就任。9月13日，他致函杜布斯教授，聲明：“由於我本人在‘自由中國’中被公認為是反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袖，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去英國生活，可能要經受許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痛苦。……這個決定將來可能使我難堪、後悔，而且會使‘自由中國’知識界喪失信心。”^③

對內，他不斷向當局進言，建議國民黨徹底改革，分化成若干黨。1952年9月14日，他致函蔣介石，建議利用10月10日國民黨大會的難得機會，明白表示：（1）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行憲四五年來未能樹立這基礎，是由於國民黨未能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2）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3）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4）表示國民黨誠心培植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一句空話，必須由政府與當國的黨明白表示願意容忍一切具體政策的批評，包括孫中山、蔣介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以作批評的對象。（5）國民黨和蔣都要罪己，要說給黨員、全台人民、大陸人民聽，換取世人的原諒。^④他希望“中華民國”能像土耳其那樣，通過選舉以和平方式轉移政權。

1953年1月16日，胡適趁蔣介石約晚飯的機會，說一點逆耳的話，據說蔣居然容受了。胡適說，台灣無人敢批評彭孟緝、蔣經國、蔣介石，所以今日實無言論自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不過，雖然胡適的逆耳忠言沒有引起蔣的不快，接下來蔣卻問召開國民大會有什麼事可做？胡適答稱當然是選舉總統和副總統。而蔣竟表示一屆國大可以兩次選總統嗎？我是最怕開會的！胡適聞言，大為驚異，感到奇怪，“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⑤

12月13日，台北《中央日報》社長胡健中在紐約透露胡適主張“毀黨救國”，由華文《生活雜誌》登載。意為國民黨改造後人數更少，僅51萬黨員的支持不夠，全台灣省人民支持也不夠，政府必須以國家至上為最高原則，超越黨派的限制，爭取全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支持。蔣以全國人民領袖的地位，領導復國運動。國民黨應自然分化，形成數個政黨，這是中國實現政黨政治最好的途徑。近年來當政黨在台灣固步自封，不但不能充分爭取黨外人士的合作，甚至喪失了許多忠誠的國民黨員的支持，十分令人失望。今天提出“毀黨救國”的口號，決不是反對政黨政治，而是希望當政黨痛下決心，放棄門戶之見，將政治的重心放在復國運動上面。^⑥

胡適對於“中華民國”，的確可以說是愛之深恨之切。1956年“雙十節”前一天早上，久已不作白話詩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愛我們的中華民國，我們紀念他四十五年的多災多難，他的災難多半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努力不夠，他的拯救還得靠我們人人苦幹。”^⑩

可是，胡適的忍辱負重並未得到正面回應，他呼籲要新聞界有更大的爭論和批評的自由，又給予“立法院”的討論自由以高度評價。但是在輿論看來：“在自由中國，只有胡適一人享有言論自由。”^⑪這無異於指胡適的自由其實是異數例外，甚至是以所有人不自由為代價的，也等於指《自由中國》其實存在於並無自由的“自由中國”之中。

《自由中國》的確從一開始就受到諸多限制，顯得很不自由。而且一些麻煩還因胡適而起。1950年9月，因胡適在《自由中國》第5卷第5號發表一封信，台當局下令全部收購，並令香港停止出版，令西北停寄。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蔣介石重獲美國的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國民黨實施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成形鞏固，與《自由中國》的關係逐漸惡化。1957年2月，《自由中國》因為第16卷第2期刊發社論《我們的答辯》，受到一連串的反駁和攻擊，甚至出版廣告也遭到半官方報紙拒絕刊登，業務發展大受影響；又受到一種煽動性激烈言論的恫嚇，擔心會有突如其來的直接損害。

在報導此事同樣持反共立場的香港媒體看來，《自由中國》的言論，只要沒有抵觸“憲法”賦予的權利，司法機關也未從言論本身提出檢控，就是合法的。“所謂言論自由，是一定要以公平原則為基礎的，倘若有一方面失去這種公平原則的保障，那自由精神便難予確立，而自由標準更無從談起。”《自由中國》在台灣發行多年，“且又在自由中國局勢最困難的時期誕生，而其反共立場，也能一貫堅持，始終不變，那即使他們的一群人士，會因懷有孤臣孽子之心，批評時政，言之過激，亦總值得曲為優容，而無損於我們中興的大業。……我們今天既然以民主自由的大道自期，以反共抗俄的艱巨自任，正應警惕自勵，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如果竟連一家稍有狷激之氣的雜誌，也如芒刺在背，不能容忍，又何足示人以廣，招徠更多熱心報國之士？”^⑫

對於香港媒體的指責，台灣當局堅決否認，2月8日《中央日報》刊載中央社訊，聲稱“我國報紙雜誌均有言論自由”。當日“行政院”新聞局長沈錡亦稱：“在中華民國所有報紙雜誌，包括《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內，均依法律，享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凡屬合法權益，均受到保障，任何報紙雜誌，一律平等，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香港方面推測，絕無事實根據。”3月22日，“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又在“立法院”鄭重宣佈：“在法律範圍內，任何自由均受保障。政府絕不利用任何技巧，對各項自由加以限制。”^⑬

可是，言猶在耳，兩年之後，《自由中國》便陷入絕境，先是被指控冒用他人名義刊登投書，雷震等人遭到傳訊。次年又因地地方選舉國民黨違法舞弊，在野黨、無黨派和民主人士在民社黨中央總部舉行檢討會，準備另組強大反對黨。雷震多方奔走聯絡，領銜出頭，觸犯國民黨的禁忌，被指控為包庇匪諜，蔣介石明確指示以軍法審判定下重罪重刑。受此牽連，《自由中國》亦被停刊。胡適希望未來十年走得更好，化成泡影。

《自由中國》的悲劇落幕表明，“自由中國”原來不僅沒有自由，甚至連爭取自由的自由也沒有。“自由中國”裡發生這樣的暴政，使得誠心支持的胡適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失望至極，連“自由世界”的領袖也覺得顏面盡失。費正清來函告以新總統肯尼迪是一個關心公民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的新政府將繼續注意像雷震案一類的事。將來恐怕會發生一派思想，“主

張為了解決‘我們的中國問題’，不恤譴責台灣，認為‘不關重要’或認作一種負擔，或一個警察國家，或不配做同盟國家。”⁹⁴大有棄如敝履之勢。

在這樣的形勢下，胡適這位“自由中國”裡唯一享有言論自由者的自由度也大受擠壓。他不贊成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希望其為國家長久打算，樹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可是順耳的好話說盡，聽者非但置若罔聞，一意孤行，還暗生殺機。儘管胡適從此對於國是問題基本沉默，有意辭去“國大”等其他職務，消極對待“修憲”事宜，不參與反對黨的組織活動，小心翼翼，謹言慎行，以防被一般偏激的人所利用，有害無益，可還是動輒得咎。1960年11月中旬，因為在《民主潮》發表紀念曾慕韓的短文有“過於頌揚傳統文化，可能是替反動思想助威”的言詞，引起“立委”和徐復觀等人的不滿及追究。⁹⁵胡適的自由已經越來越小了。

三、《自由中國》與冷戰思維

胡適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的領袖，也發表過以自由主義為主題的演講，可是對於中西的自由傳統，並沒有系統認識和深入研究，所講自由主義，也坦承不過是言人人殊的個人看法。待到辦《自由中國》之後，才發現“自由”是古人常用的一個字。⁹⁶又經過仔細思考，覺得古代政治思想並不算發達。所謂百家之言，其實只有兩個大趨勢：一是“無為”的喊聲，代表自由思想；二是集權的有為政治。⁹⁷而在歐美，“英譯文只要民主原則包含著平等、自由和友愛這些觀念，那麼《聖經》就是世界上最講民主的一本書了。……從十六世紀以來，新教贊成政治自由。除了《聖經》，他們拒絕承認任何終極的權威。”⁹⁸

斷言《聖經》最講民主，固然與指孟子的民本說為民主思想一樣，都是附會。不過歷史文化社會不同，的確是導致制度差異的要因。中西“自由”意涵的歧異，曾經讓嚴復在翻譯時大為困擾，必須採用不同的漢字加以標識，以示區別。胡適注意到中西自由的本義有別，卻沒有追究中西文化傳統的不同如何影響行為習慣和制度建設。由於中西“自由”一詞義涵的混淆，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本來聲名不佳。早在清季《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就曾借“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之口，向世人傳達自己鼓吹自由的複雜心情：“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⁹⁹加之民初自由黨帶有秘密社會的色彩，又較為激進，近代中國思想界中的自由主義顯得相當另類。胡適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不肯接受自由主義領袖這頂桂冠，且對自由主義之稱有所保留。¹⁰⁰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背景下，本來頗為冷門和邊緣的自由主義忽然成為國人熱議的話題。而胡適高揚自由主義旗幟，將中國乃至世界分為自由和奴役兩部分，甚至為了追求和維護自由主義而堅決反共，寧可擁護專制獨裁政權，並非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一貫立場和主張。這樣極端截然的兩分法，與二戰後冷戰思維的形成密切相關。

一般而言，冷戰思維的所指能指已經耳熟能詳，但其淵源流變及內涵外延究竟為何，還有進一步深究的空間。從胡適的記述以及《自由中國》的來龍去脈可以看出，冷戰思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民族主義、極權專制甚至納粹、法西斯主義相聯繫，另一方面，則是將美國與歐洲的民主傳統相連接，突顯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袖地位和作用，而將所有反共的國家統統劃歸“自由世界”，從而將國際政治分野變為極權與民主的對立，使反共抗俄披上合理合情的外衣。在胡適看來，本來未必自由民主甚至實行專制獨裁的政權，只要與美國站在同一邊，便屬於“自由世界”。如此，“自由世界”的自由不過招牌，美國作為“自

由世界”的領袖，其實是以民主自由為政治博弈的工具，與蘇聯爭奪霸權和勢力範圍，並用各種方式最大限度謀取自身的利益。

胡適循著上述理路將相關認識系統化，卻有意無意迴避了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對立。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都是殖民主義大國，其與後起的德、日等國的衝突，很大程度是因為要重新瓜分世界產生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因而二戰期間日本甚至打著反對白人殖民、解放黃種的旗號。而戰後歐美依然延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以其作為自由民主的守護者未免有些滑稽。至於種族歧視的問題，也依然嚴重存在，戰後澳洲曾計劃引進一百萬美國退伍軍人，卻公開聲明只要白人，不要有色人種，以防亞裔尤其是華人進入。實行門羅主義的美國，對外是比較隱形的變相殖民，對內則是嚴重的種族歧視。

稍加留心就不難發現，民主制無論在古代還是近代，背後都有少數對多數奴役的隱疾，這或許是特定國家建立和實行民主制的重要基礎。儘管民主制的自我調適能力很強，後來制度改進很大，迄今為止，包括美國在內，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手段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奪，仍是維繫外部權勢和內部機制的重要憑藉。

在反共抗俄的大戰略下，歐美強國扶植和利用形形色色的專制獨裁政權，不僅出於對抗“共產極權”的需要，也不無控制世界便於掠奪的考量。包括胡適不能不依附的國民黨政權，非但不能擔負自由民主的責任，而且是專制獨裁的化身。國民政府得到美國的支持，反而使後者聲稱的維護自由民主顯得相當虛偽。但在胡適眼中，這些都似乎視而不見。

二是對蘇聯認識的變化。1948年1月21日夜，胡適致函周鯁生，談“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後者撰寫了《歷史要重演嗎？》，指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政策根本改變，從防制德、日兩個戰敗國復興，轉而扶持利用兩個強敵抵制一個戰勝的盟國。胡適表示並非如此，並懷疑周“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的斷言，認為戰後蘇聯可能是比德、日更可怕的侵略勢力，因其本錢更雄厚，野心更大，勢力更普遍。中國有此憂慮者特別多。因為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為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

不過，直到這時胡適仍然承認：“我向來對蘇俄是懷著很大的熱望的，我是一個多年深信和平主義的人，平常又頗憂慮中國北邊那條世界第一長的邊界，所以我總希望革命後的新俄國繼續維持他早年宣傳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侵略主義的立場。這種希望曾使我夢想的俄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④胡適用這樣的觀念解釋蘇聯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直到1939年9月以後，因為瓜分波蘭和侵略芬蘭，胡適開始對蘇聯產生懷疑，但還不願從壞的方面去想，因為不願有一個侵略國家做中國的北鄰。1941年底他在美國政治學年會演說，還表示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邊界的好榜樣，並且被人屢次引用。

胡適對於蘇聯的憂慮，國人能夠感同身受。清季以來，對中國懷有毫不掩飾的領土要求的日俄兩國，始終是有識之士的心腹之患。而中共與蘇聯的緊密關係讓不少知識人心存顧慮。蘇聯對中國的掠奪和侵佔，曾引發普遍的抗議。不過，二戰前的三十年間，民主制在國際上備受質疑，被認為已是明日黃花。所謂過時，體現於兩方面，其一，在許多進步青年的心目中，蘇聯才是自由的理想國家和人類進步文化的代表，英美式的民主則相當虛偽。理論上說，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勢必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只有社會主義主張的經濟民主，才能超越政治平等，達到社會平等。這在胡適入學讀書的時代，就已經開始變成常識。因而社會主義成為普遍的嚮往，相信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戰後的歐洲，不少國家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兼顧兩面。胡適也一度

承認民主包括社會主義，只是堅持自由主義的和平漸進改革，反對暴力急進革命。

其二，英美式民主缺乏效率，不如集中制高效。蘇俄、德國和義大利的集權政治，都曾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弱小民族國家的高度重視。近代以來，民主自由成為普遍嚮往追求的理想化目標，但是受列強殖民擴張的逼迫和社會差距懸殊的制約，具體以何種模式為範型，通過何種途徑實現救亡圖存，取徑各異。儘管美國成功地將淘金者的發財夢改為追求與捍衛自由，使自己站上道德制高點，美式共和又一度為國人所熱望，一戰之前，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給國人的觀感並不好，知之較深的孫中山和走馬觀花的梁啟超都不免失望，後者更是從美洲歸來夢俄羅斯。其非議美式制度，除了國情不宜，還有貪腐和低效的弊端。一戰結束，國人對提倡公理戰勝強權的威爾遜一度寄予厚望，可是巴黎和會的一幕幕鬧劇醜劇最終令人大失所望。反對歐美列強及其支持的國內反動軍閥和獨裁政權，使得革命由以歐美民主為範型轉向以新俄為楷模。二戰爆發，幾乎整個世界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嚴重威脅，美國卻袖手旁觀，試圖局外中立，避免捲入戰事，還趁機發戰爭財。正是因為得到美國源源不斷的戰略物資供應，日本才能堅持長期對華侵略戰爭。

二戰後期，歐洲各國的共產黨遊擊隊與政府軍發生普遍衝突，讓胡適預感到戰後國共關係可能出現的態勢。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條約的逼訂等連串事件，以及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耳聞目睹中國兩三年間從蘇聯手裡吃的虧，受的侵略，胡適不能不拋棄 20 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會變成可怕的侵略勢力。五六年前胡適與周鯨生兩人還對蘇聯那樣熱心的期望，當時親眼看見西方民主社會對蘇俄那樣真誠的友誼。而蘇俄今日被人看作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真是蘇俄的大不幸和絕大損失。^④

胡適對蘇聯認識的改變，除了更多地瞭解蘇聯本身的作為，歐美的反共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美國參戰前，就有人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法西斯並列為極權政治。蘇聯大清洗運動的內幕被流亡者、情報機構和宣傳機器不斷披露，令胡適相當震驚。在邱吉爾講話和杜魯門宣言之後，胡適很快便站到“自由世界”一邊，打出自由主義的旗號，鼓吹反共抗俄。1947 年 7、8 月間，他連續以各種形式公開表明對兩個世界的立場態度，在《獨立時論》發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指政黨分兩類，一是英美西歐的甲式政黨，一是後起的俄國共產黨、義大利法西斯黨、德國納粹黨等乙式政黨，所謂“兩個世界”的劃分，正在這自由不自由、獨立不獨立、容忍不容忍的劃分。

在北平中央電臺廣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胡適提出三個理想目標之一，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獨立的人格。從歷史上看世界文化的趨向，自由民主是三四百年來的最大目標。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潮流，不過是小小的波折逆流。

在《獨立時論》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胡適回應聽眾對《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廣播的意見，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深信幾百年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深信民主政治雖不是完美無缺，確養成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民主政治全靠容忍尊重反對黨的雅量。三四百年形成英國、北美洲、南太平洋三四個民主自由運動的大中心，最近 30 多年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自由民主的聯合力量大勝，使自由民主運動站得住。而蘇聯則是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專制集團，至今不敢自信，用冷酷的暴力壓制大多數人民，不敢和別國自由交通，在中國處處回到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中國人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解決全

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④

蘇聯與美國，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線的盟友，隨著主要戰場的勝利在望，雙方的分歧和對立日益顯現。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得付出了巨大犧牲的蘇聯試圖從戰敗國獲得補償，又趁機以發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名義擴張勢力範圍，甚至不惜侵佔或損害同盟國家的利益，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加上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對西方的壓力，自身失誤太多，從制度到政策，非但未能延續戰前社會經濟發展成效顯著、代表被壓迫人民嚮往自由和希望獨立富強的美好形象，反而將隔絕西方的鐵幕罩在民眾身上，自挖牆角，自毀長城，終於轟然崩塌。蘇東的解體無形中坐實了冷戰思維下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攻擊性宣傳。

與此相對，美國的形象卻一步步被塑造造成整個歐洲自由民主的傳承和守護，坐上了“自由世界”領袖的寶座。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對日本的縱容養虎貽患，讓美國自食惡果，被迫參戰反而成就其在西方世界的領導和統治地位。自由世界本來是反法西斯陣營整體，可是歐洲顯然不願意與蘇聯分享榮譽。美國的加入，使得東西兩條戰線能夠分庭抗禮。戰後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兩強爭霸，美國趁機將冷戰描繪成“自由世界”與“極權統治”的對立，社會主義陣營被妖魔化為法西斯主義的延續，而社會主義與被壓迫民族反帝反殖解放運動的聯繫則因為蘇聯的稱霸若即若離。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內戰成了國際冷戰全局下規模最大的局部熱戰，國共雙方分別與美蘇結緣，戰爭的勝負，影響冷戰的格局，同時也造成了冷戰思維的複雜性。儘管國民政府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聲望一度如日中天，抗戰期間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經開始讓國民離心離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了反共和獲取美援，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但是反共不僅很難與民主自由劃等號，相反成為反民主的重要體現，而共產黨打倒專制獨裁的目的就是爭取自由民主。

中共在堅持民族利益和依靠蘇聯之間取得相對平衡，國民則普遍覺得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作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所傳導出來的自由之聲相當異樣和刺耳。即使所謂英美派知識分子和顧頡剛這樣與國民黨長期合作的學人，儘管對於蘇聯有所顧忌，對於集體主義有所疑慮，甚至對中共並不瞭解，身處專制統治之下，在國共之間也不得不取捨分明。當鼓吹以自由主義對抗極權主義的喧聲響起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向何處去的問題就被提上檯面，有人明確提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反蘇反共。^⑤而胡適附和美國偏向蔣介石政權的自由主義之說，遭致來自各方的公開批評。

在胡適和《自由中國》同仁看來，與“自由世界”站在一起的“中華民國”是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只是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是民主政權，而是認定戰後世界是自由與極權的對立，“中華民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才有前途，因此主張對外必須與美國一起，甚至要全部服從美國，犧牲自我，對內則不得不支持國民政府，以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在號稱堅持徹底獨立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胡適相當諷刺。“中華民國”不僅失去大陸之上“自由中國”的象徵，退守台灣也很難成為“自由中國”名副其實的代表。

中國是世界的縮影，冷戰名義上是“民主陣營”對抗“共產極權”，可是站在“自由世界”一邊的許多國家不僅沒有實行民主，而且是專制集權甚至軍事獨裁。這些政權在本國是多數民眾堅決反對的眾矢之的，只是因為堅決反共抗俄，便得到美國的援助庇護。如此一來，“自由世界”與“民主自由”的關係變得相當模糊。加上歐洲不少國家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冷戰實際上既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更不是“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的抗爭。因此，在各國民眾看來，

美國非但不是民主自由的捍衛者，相反，推翻親美的專制獨裁政權，才能爭取實現民主自由。

在歐洲中心三百多年的籠罩之下，自由成為絕對追求，而民主是制度保障。民主並非最好的制度，只是目前所知各種制度中壞處較少，且自我糾錯能力較強。歷史上的民主制固然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奪奴役之上，即使近代，殖民擴張也是列強實行民主不可或缺的財富集聚途徑和社會發達保障。二戰後，民主是否普遍適用，越來越不被質疑，公開反對或否定民主的聲音日漸減少甚至基本消失。人們主要關注或有所爭議的是，民主是否只有一種形式，是否需要適應不同的國情有所調整，變化之後能否一如既往起到保障個人自由的作用。

就在胡適等人在海峽那邊為“自由中國”苦鬥之時，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本《民主與自由》，作為“青年共產主義者叢刊”的第一集，執筆人為吳克堅（《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馮定（《從民主說起》）、楊東蓀（《何物自由主義》）、何畏（《也談民主和自由》）、張志讓（《為保衛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而鬥爭》）、張仲實（《蘇聯的民主制度》）、丘英（《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陳翰笙（《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自由》）、錢學森（《我在美國的時候》）、金默生（《揭開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內幕》）、張華（《民主不能主的美國》）、翦伯贊（《從學術自由談起》）、許廣平（《新時代的喜悅》）、胡仲持（《所謂新聞自由》）、葉聖陶（《解放前後的出版自由》）、艾蕪（《解放前後》）、曹禹（《從一件小事談起》）、張定（《解放前的大學生》），主旨就是獨裁不是民主，專制不是自由。

其實，就理論而言，民主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理想的終極制度，超越只是早晚的問題；就事實而論，即使最理想的民主制度，也沒有真正解決所有國民個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二戰後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持續不斷，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待遇不公，就是明證。而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同樣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這些問題至今未能徹底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只不過在不同制度下，原因和責任被分別歸咎於個人或是政府及社會。

政府掌控的權力越大，背負的責任也就越多，因此“自由世界”的宣傳很容易抓住集權的弊端進行攻擊。事實上，美國作為民主自由的典範與保障，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和守護神，美國可以也應該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建立和維護自由民主，甚至可以在維護民主自由的旗號下為所欲為，才是冷戰思維製造的最大神話，也是戰後最廣泛最深入洗腦的典型。儘管不少人抱怨美國的具體作為，卻被一頂自由民主的大帽子壓住，不能根本質疑其作用（當然也有無可奈何的因素）。雙重標準或許能夠得逞於一時，卻不可能糊弄一世。輕易宣稱哪一種社會制度已形終結，到頭來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天方夜譚。

胡適對自由真心嚮往，有人說他為民主自由奮鬥了40年，到處散播著“自由”種籽。^⑤但是，將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於外援或外力干涉之上，甚至不惜將自己與獨裁政權綁在一起，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無奈與悲哀。早年胡適為了效率，可以容忍社會主義集權，晚年為了反共，可以容忍國民黨獨裁。尤其是不假思索地斷言社會主義與自由不相容，完全忽視戰後歐洲普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歐美為了自身安全採取各種殘暴手段，以及在“自由世界”的旗號下不少軍人獨裁的現實。所謂“自由世界”與“極權主義”的衝突，說到底只是反共與否，與民主沒有直接關聯。將專制獨裁的國民政府認為“自由中國”，由此搭上“自由世界”的便車，一方面如顧頡剛所料，幫腔有損清譽，殉葬太不值得，另一方面，堅決而盲目反共，在海峽對岸種下惡果，被反共與自由相混雜的冷戰思維長期洗腦的青年，喪失了民族文化的情懷，卻沒有踏上民主自由的正道。

與“自由中國”相關聯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值得後人深刻反省並繼續努力

